

地缘政治经济视角下的全球供应链重构

——基于印欧走廊和“一带一路”的对比分析

赵丹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

DOI:10.12238/ej.v8i2.2285

[摘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供应链的发展离不开各国的经贸合作。美国的印欧走廊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二者具有很多共同点与不同点,同是以亚洲国家为起点以欧洲为终点的经济带。然而二者路线不同,连结的国家不同,贸易品不同,二者之间竞争与合作对欧亚大陆的经济格局的影响巨大。本文基于印欧走廊与“一带一路”的对比分析,深入研究地缘政治经济视角下的全球供应链重构问题。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印欧走廊;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FO **文献标识码:** A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supply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s and econom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do European Corridor and the the Belt and Road

Danyang Zh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countri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pply chai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The Indo European Corrid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China were born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two have man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oth being economic belts that start from Asian countries and end in Europe. However, the two have different routes, connected countries, and traded goods.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pattern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do European Corridor and the the Belt and Road, this paper deeply studi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from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引言

全球供应链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跨国界的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然而,随着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封锁等现象频发,迫使各国重新评估和调整其供应链战略。本文将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并探讨其重构路径。

地缘政治作为主权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战略手段,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稳定与变革的晴雨表。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合作的地缘政治战略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通常处于相

对稳定状态;而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战略时,表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危机状态或出现变革的态势。印欧走廊与一带一路是两条不同的供应链。分析不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构造了一个由两条供应链组成的网络模型,比较了产品替代与互补效应以及不同的风险分担方式对企业决策及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供应链概念从商品链、价值链发展而来,是指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供应链权力主要体现在主导性跨国企业与其他成员企业间的关系上。然

而,随着大国竞争加剧,国家对供应链的干预与塑造持续加强,国家的介入使得供应链从效率与利润驱动,变成大国博弈的组成部分,供应链权力亦逐渐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因此,在竞争格局下,供应链权力结构呈现为霸权国强化对供应链的“控制”与崛起国维护供应链稳定的“平衡”之间的制衡,以把全国推动的关键技术与产业“断链脱钩”与崛起国对其“反制与维护”为主要表现,进而影响国际供应链合作格局。霸权国的控制力主要体现在技术等上游环节,而崛起国因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其平衡力主要体现在制造能力与市场力量^[8]。“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一带”主要是从中国贯穿中亚与俄罗斯直达欧洲;“一路”则是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中东和东非。“一带一路”并非一种机制或实体,更是一种合作发展的思想和举措,其目的是通过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象征意义,引领、带动、促进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能源合作日益深入,对我国的能源行业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大都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丰富的国家,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我国成功与周边国家实现能源互通、互进,使能源成为国与国交流与融汇的桥梁,使我国能源产业走向世界中心^[9]。在2023年9月召开的新德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美国、欧盟、印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色列等国达成协议,将共同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简称“印欧经济走廊”)。IMEC将包含两条走廊,一条是连接印度与阿拉伯湾的东部走廊,另一条是连接阿拉伯湾与欧洲的北部走廊。从表面上看,“印欧经济走廊”是继“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后,美国参与主导的又一项难以落地的基建项目,但从深层看,该基建计划透露出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逻辑和意图^[4]。印欧经济走廊被称为“现代香料之路”,而一带一路又称“丝绸之路”。不论古今二者都是连结世界经济的著名经济带。美国主导的IMEC仍然是经济领域的跨国合作,其目的离不开美国自身经济利益。IMEC将会从跨国贸易、市场开拓和能源生产的等角度影响美国的经济利益^[5]。有一种说法是印欧走廊是印度和美国的一次合谋战略。而一带一路则主要代表了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二条经济带都要贯穿中东抵达欧洲。将印欧走廊与一带一路对比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对比二者的供应链权利结构,从而为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研究提供更加充分论据。近些年在欧亚地区爆发的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也可以视为两种权利争夺的爆发。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分为结构性危机和周期性变化对供应链权利结构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明等多个层面的悖论,这些危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供应链的权力结构。首先,政治悖论导致政治力量的对比不断变化,掌权者与抵制运动之间的博弈持续进行。这种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增加了供应链中的政治风险,使得供应链的权力结构更加复杂和多变。其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公司可能通过降低工资来提高利润,但这会抑制市场需求,最终影响所有公司的利润。这种经济悖论导

致经济波动,进而影响供应链的稳定性。再者,意识形态悖论体现在国家和民族的定义及关系上,这种复杂性使得供应链中的参与方在利益诉求上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行为可能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影响供应链的权力结构。最后,现代化和西方化的矛盾使得供应链中的文化因素更加复杂。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合作可能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进而影响供应链的权力结构^[7]。疫情冲击了过去相对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系统,“芯片荒”、“口罩荒”、“疫苗荒”等倒逼各国升级自身生产供应体系^[6]。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下,全球产业竞争加剧,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再布局,推动全球供应链和贸易链加速重构。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冲击,中国产品供应全球,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但同时,中国也正在经历个别国家对我们技术封锁和消费抵制的双重夹击,国内外竞争加剧,必须要构建能够抵御外部冲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大国博弈背景下,全球供应链重构趋势凸显。欧美发达国家加速再制造业化,以期巩固传统制造业优势,并大力发展高端、高附加值产业;国内大力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攻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政策引领下,高科技及新兴产业投资将进入新一轮大幅增长的周期。全球朱格拉周期开启:碳中和、美国更新和供应链再造。朱格拉周期是中周期代表性理论,它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为约10年的周期性波动而提出,该周期是以国民收入、失业率和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生产、利润和价格的波动为标志加以划分的。当代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标准的周期是持续时间为十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3]。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力水平,而在提升生产力的水平过程中,就需要企业不断对设备进行更新与投资。朱格拉周期正是以设备更替和资本投资为主要驱动因素。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引领下,新一轮“朱格拉”周期或将打上明显的“能源革命”烙印。能源革命下的“朱格拉周期”,传统能源、原料供给的持续受限,或将导致商品价格长期高企、全球通胀“高烧不退”,以及部分抢得“先机”的传统行业维持高利润状态。对于全球经济而言,碳中和引发的设备增量添置投资浪潮,将为需求注入“强势动能”。但同时,由于需求仍将保持一定增长、而供给弹性受限,油、煤及钢铝等传统能源、原料的供需缺口或将持续存在、价格趋于高企。受此影响,全球通胀或高烧难退,部分抢得“先机”的传统行业有望长期维持高利润状态^[7]。

1980年之后,我国经历了完整的四轮朱格拉周期,当前正处于第五轮的萧条期当中。而每一轮新周期的开启往往都经历过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1)1980年我国财政收支形势持续恶化,1981年提出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2)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此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我国加入WTO;(4)2008年经济危机后,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5)2015年制造业产能过剩,随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推动新一轮投资更新。因此,新一轮朱格拉周期的开启,需要等待一个信号的发布。

根据10年规律,2017—2027年预计将形成一个完整的朱格拉周期,目前正处于需求触底反弹、产能利用率上行及投资降幅缩小的复苏阶段。在2022—2023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逐步上行,CPI略有回落而PPI低位反弹。符合朱格拉周期中的复苏期表现。从固定资产投资、通胀与大宗商品价格、信贷投融资三大因素对朱格拉周期逐项分析。综上,笔者从固定资产投资、通胀与大宗商品价格、信贷投融资三大因素对朱格拉周期逐项分析,并以铜为大宗商品代表进行周期比对,可以看到,目前我国仍处于复苏周期内,大宗商品受外部因素短期干扰回落,但中长期仍有上行预期。从资产配置角度来看,当前复苏阶段,商品配置最优,其次为股票,最后是现金和债券,商品之势,大有可为。

2 理论分析

2.1 供应链框架下的比较优势理论

只要有国家要素禀赋的不同,产品可以分为不同的生产阶段或工序并在空间上可分离,各阶段或工序的要素投入比例有差异,在不考虑运输成本等额外成本的前提下,依据比较优势进行产品内分工就会节约成本,获得利益。这也可以部分说明现实中全球供应链或外包现象产生的原因。

伴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发达国家企业采用全球供应链的方式将本国优势最小的劳动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生产转移到劳动充裕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分析,这种产品内分工带来了最终产品生产成本的节约。在假定是小国,是国际市场价格接受者的前提下,生产成本的节约和调整不会影响国际市场上X和Y这两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小国相对生产成本的变化和调整,造成小国内的最初要素价格比例与未改变的商品价格比例不一致。由于X产品成本下降,但其相对价格没有发生变化,意味着生产商因此获得的利润增大,高出了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因此就会有更多的厂商进入或现有生产商就会想法扩大生产。X1产量的增加会导致X产量的增加,采取供应链方式将劳动密集型的X2工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X产业,比分工转移以前需要使用更多的资本和劳动。虽然X产业的以前的X2生产的工作机会失去了,但新增加的用于进口X2的其他产品生产增加的就业会提供很大一部分工作机会,同时,担心,X1生产的扩大和组装的扩大也会提供不少工作机会。因此,担心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夕阳产业因为分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会损害发达国家本部门工人的工资和减少就业机会的观点在上述分析中是没有依据的。

假定资本禀赋丰裕的甲国是一个小国,其X产业产量的增加不会影响国际价格。现在放宽这一假定,假设该国是大国。在大国情况下,不考虑需求变化,X产品产出的增加会导致市场上该商品的供给的增加,从而导致劳动密集型工序零件的进口价格下降的压力,而同时,出口品Y产品的生产下降,国际市场上供给减少,出口价格就会提高。进口价格的降低和出口价格的提高,会显著改善该国的贸易条件。

进口价格的降低会使X产业的产量相对减少,而Y产品则会扩大生产,这两种价格的变化会同时对劳动与资本的价格比例

施加调整的影响。劳动价格会相对降低,资本价格会相对提高,调整方向刚好与产品内分工或零部件分工所带来的调整方向相反。但只要产品内分工所带来的效应大于贸易条件改善所造成的效应,X产业的生产就会扩大,Y产业的生产就会下降。

一个发达国家采用供应链方式,实行产品内分工,把劳动相对密集的工序或零部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会提高该产业的就业水平、扩大生产并提高相对资本价格的劳动价格。

2.2 在供应链中建立伙伴关系——合作进化理论

“一带一路”的提倡以合作共赢的“发展思维”取代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阿克塞尔罗德,是著名的博弈论专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在他的著作《合作的进化》中根据博弈论原理设计了一系列计算机仿真游戏。游戏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那些更愿意合作、从不首先背叛的“好人策略”全面胜利,而那些总想着是不是背叛一把来捞取好处的“坏人策略”都没好下场。游戏结果证明了,即使在霍布斯想象的丛林竞争中,也只有合作策略才是最优生存策略,人们仅仅为了个人利益也会自发地展开合作。这就使得合作机制不仅可以在竞争对手之间自发形成,而且能够长期维持,甚至是不断进化。双赢思想开始出现在供应链的例子之一,是供应链代管库存(VMI)或共同管理库存(CMI)。供应链中每一步的传统补货方式是由客户向供应商订购。通常由于没有客户需求提前通知,供应商不得不以安全库存的形式持有存货作为应对不确定性需求的缓冲。同样,客户也要对同一商品持有安全库存以预防缺货哦。这种传统的正常交易方式最终将使供应链中的存货水平更高、服务水平更低和响应性更差。供应商代管库存(VMI)的思想是客户不再向供应商下订单,而是持续地共享实际需求信息。而共同管理库存(CMI)是供应商代管库存思想的进一步扩展,客户与供应商根据促销活动、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竞争活动等,共同规划适当的存货水平。VMI和CMI两种思想都可以称为“信息的价值增值交换”。由于客户为供应商提供商品销售和产品功能信息,更多响应的供应创造了价值。

供应链整合的关键是信息共享。根据同样的需求、存货和市场趋势信息,可以形成具有成本效率的物流流程。然而,信息共享的好处不只是成本缩减。企业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由于将信息系统联结在一起使企业之间更加相互信赖。

供应链中的这些协作模式正在逐步开始改变竞争环境的状态。早些时期有人提出,企业不再作为单个企业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而是作为供应链或网络参与竞争。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成功或者失败的一个决定性要素是作为具有共同战略目标及支持这些目标紧密连接的流程网络,供应链被整合管理的程度。由此可以提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将是网络成员之间关系的实力和质量——既包括“垂直”的供应链伙伴也包括“水平”联盟伙伴。

当我们把企业变为国家,合作进化理论依然适用。全球供应链的竞争成败由组成供应链的国家的政治实力^[7]和经济禀赋决定——既包括“一带一路”和印欧走廊沿线各国上下游之间的合作,也包括两条供应链的水平合作关系。

3 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基于中国产能过剩的国情,向沿线国家提供能源产品、制造品和基建服务。而印欧走廊则是美国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印度,从而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该产业就业水平、扩大生产。二者的共同点就是通过国际分工合作实现利润最大化。下面我们将对比分析这两种策略来作为支持重构全球供应链的论据。

3.1 首先对比供应链上游的生产商中国和印度

从出口额来看,中国远超印度,是名副其实的出口大国,但是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印度也具有极大的出口潜力。中印的出口价值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几乎齐平。印度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服务占商业服务出口、农业原材料出口、燃料出口、食品出口方面都比中国更具优势,但是中国乃是制造业大国,只通过数量庞大的制造业出口便在整个出口数量上远超印度^[6]。中国一直强调科技创新,通过几年的积累,中国的科技远超印度,这一点也体现在出口数据上。中国的科技出口领先印度。除此之外,中国在物流效率方面也是印度所不能比拟的。

3.2 接下来对比沙特和土耳其

除了境外势力外,中东地区有五大强国:土耳其、以色列、埃及、伊朗及沙特。

其中沙特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大国”,储量居世界前列、产量居世界第一。土耳其则是中东综合国力最强、军力最强及影响力最强的国家。赫赫有名的奥斯曼帝国的精华全遗传给了土耳其。土耳其扼守黑海海峡和土耳其海峡,是中亚和欧洲的转接枢纽,地缘位置极为重要。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国土面积相当。沙特和土耳其经常在美俄之间来回横跳,谋取好处。

沙特和土耳其分别作为印欧走廊和“一带一路”的储油国,需要详细比较二者的优劣:在进口方面土耳其要强于沙特,其中土耳其的进口产品主要包括燃料、货物、矿石金属进口。而在服务、制造业和实物进口方面则要逊于沙特。而在出口方面,沙特主要以出口燃料为主。土耳其以其覆盖面广种类齐全的出口远远超过沙特,出口的商品包括制造业、农业原材料、服务、高科技产品等。覆盖一二三级产业。然而在物流效率方面两国不相上下。

3.3 中美俄、中美印、中印俄关系对比

经典的三角理论洛厄尔·迪特默的博弈论根据三边关系的价值差异(积极关系与消极关系)和关系均衡性差异(对称性关系和非对称性关系)建立了一个2*2矩阵并识别出四类三边关系:对称的消极关系(“单位否决”),对称的积极关系(“三人共处”),不对称的消极关系(“稳定婚姻”),不对称的积极关系(“浪漫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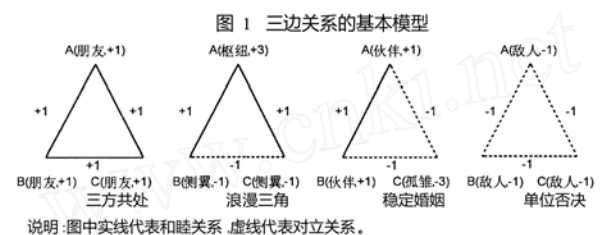
3.3.1 现代中美俄关系

在此框架下,他将1949年-1978年的“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60是所谓的“稳定婚姻”时期,即中苏关系和睦,构成积极关系,而同第三方(美国)都处于敌对状态;1960-1969年中美苏三方则发展为“单位否决”关

系,在这一阶段,中美苏三方彼此敌对,三国之间不存在积极关系,整体上属于一种对称的消极关系;1970-1978年中美苏大三角又演进为“浪漫三角”关系,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特点是两松一紧,即中美关系改善、美苏关系缓和、中苏关系处于敌对状态^[2]。在此基础上,台湾学者包宗和与吴玉山对三角关系中行为体的角色地位和收益关系进行了量化。他们将具有和睦关系的两方各赋值1分,而具有对立关系的两方则各得-1分;每一方的收益得分总额等于该方与另外两方关系的得分值减去另外两方相互关系的得分值。而现在的中美俄关系如果按照收益关系进行量化,假如中美关系取值-1,中俄关系取值-1,美俄关系取值-1。则美国得-1分,中国得1分,俄罗斯得1分。目前中美俄关系属于稳定婚姻。然而按照这种分析,成为朋友的收益并没有最大化中国的利益。也即中国只有与中美关系取值为1,才能成为三方中的关系的枢纽而获得最大收益。因此中美关系不能为对抗关系,取而代之的应为中美合作。

3.3.2 中美印关系

假如美印关系取值为1,中美关系取值为-1,中印关系取值为1,则印度得3分为枢纽,而中美分别得-1分。属于浪漫三角关系。而假如中美关系取值为1,则三方共处,三国互为朋友,这也是现在中国现在修复与美国关系在中美印关系中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2分。



3.3.3 中印俄关系

假如中印、中俄、印俄关系分别取1分,则自然中印俄的三角关系属于三方关系,互为朋友。而印度最好与中俄保持朋友关系,假如印度与中国关系恶化,则会导致三角关系变为以俄罗斯为枢纽的浪漫三角关系,中印各自损失2分。

3.4 一带一路和印欧走廊的合作

为了简化研究一带一路和印欧走廊的对比,本文将一带一路简化为“中俄罗斯欧”四方关系对比印欧走廊的“美印沙欧”四方关系的对比。假设中俄罗斯欧决定合作记为1,决定不合作记为0。分析在俄乌冲突爆发(Cgh=12)的情况下,四方合作是否稳定,是否哪一国更改策略;再分析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同时爆发(Cgh=6)的情况下,四方合作是否稳定,是否哪一国更改策略。利用Matlab对各博弈方的演化轨迹进行数值仿真,并进行上述情景分析,同时进行动态系统均衡点渐进稳定性分析^[1]。如法炮制,对“美印沙欧”四国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同时爆发(Cgh=2)下,四国关于合作博弈的稳定性的影响。得出结论,当只有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中俄罗斯欧”四国的决策会受到冲击,尤其是

欧洲会由合作变为不合作,但总体来看合作的稳定性并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而当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同时爆发时,合作的稳定性会遭到严重影响,巴以冲突会使土耳其的决策受到影响但影响不大。而在两种冲突同时爆发下,会导致“美印沙欧”的合作关系变得极其不稳定。尤其会对沙特和欧洲的决策产生严重影响。总之,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一带一路和印欧走廊合作的前提。在地缘政治冲突激烈的情况下,会使各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变得不稳定。

4 结论

本文基于供应链框架下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会提高各国收益水平和生产力,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国家要想获得更多的收益,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应该尽可能地进行与其他国家国际贸易。同时,阿克塞尔罗德的合作进化理论得出,当可以重复无限次博弈的情况下,合作比传统的赢输关系可以为博弈双方带来更大的盈利。同时,又通过对一带一路和印欧走廊的关键国家进行两方、三方、四方博弈得出以下结论:现阶段中国的国际经贸综合实力要略强于印度,土耳其的国际经贸的综合实力要略强于沙特阿拉伯;中国只有与美国修复合作关系,才能在中美俄和中美印的三角关系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与此同时,印度不能与中国的关系恶化,否则将在中印俄的三角关系中受损;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题。然而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接连爆发,地缘政治经济危机不断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和印欧走廊的经济合作的稳定必将受到影响。

[参考文献]

- [1]孙淑慧,苏强.重大疫情期医药研究报道质量监管四方演化博弈分析[J].管理学报,2020,17(9):1391-1401.
- [2]陈志敏.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5-22.
- [3]李梓佳.中国的能源战略与能源金融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20(10):5-8.
- [4]张凡.全球两大基础设施倡议应当考虑合作[N].中国贸易报,2023-01-17(007).
- [5]王鹏.“印欧经济走廊”暴露美国全球地缘战略意图[J].世界知识,2023(22):39,42-43.
- [6]秦琳.印度半导体战略的驱动因素、实施路径及前景展望[J].南亚研究季刊,2024(2):21-41.
- [7]陈杨.自由主义的危机——评门克《自由主义的危机:政治与管辖的辩证法》[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2(1):146-154.
- [8]金香丹.拜登政府“印太供应链联盟”的战略逻辑与困境——基于供应链权力视角的分析[J].东北亚论坛,2024,33(01):80-95+128.

作者简介:

赵丹阳(1994--),女,汉族,河北石家庄市人,博士研究生在读,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方向:世界经济。